



地鳖虫消肝肿验证

肝肿大为临床之常见症，多见于急、慢性肝炎、肝硬化等，尚有一些原因不明者。有的患者在治疗上颇为棘手，而且长久肝肿大不消亦为患者一大精神负担。余在临证遇有此类患者时，恒于辨证的基础上，汲取已故上海名医章次公氏之经验，以地鳖虫研末，每次1.5克，红参3克煎汤送服，每收卓效。尝治一李某，男性，年届不惑。体检时B超发现肝肿大在右肋下5cm，没有明显病征，一时也查不出病因。适余巡诊至此，而来求诊。视患者身强力壮，右肋无所苦，唯夜寐恶梦纷纭，口苦，舌红苔黄腻，脉弦，即处予龙胆泻肝汤合失笑散治之。服六剂后，恶梦、口苦均减，脉舌如前，仍以原方略加减，并嘱以配服章氏地鳖红参方，连续服用10余剂。余再次巡诊时，嘱作B超复查，肝肿大明显缩小，在右肋下1.5cm，余处予一贯煎配章氏方，嘱以常服。后因患者工作繁忙，未能连续服药，两年后，因感右胁胀闷，再作B超检查：肝肿大4cm，肝功能检查：白、球蛋白比例倒置，转氨酶、麝絮均异常，诊为：慢性肝炎、肝硬化，再次求诊。余依上次经验，如法施治，再投章氏方加汤药，又服20余剂，复查时，肝肿大消失，白、球蛋白比例及肝功能均正常。余嘱间服章氏地鳖红参方，每周一至二次，随访二年，肝未再肿大，病告瘳。

考地鳖虫一名蜜虫，《本经》言其“主血瘀症瘕，破坚”。《金匱要略》治瘀血方，如大黄蜜虫丸、下瘀血汤，等皆用之，乃取其逐瘀破积之功。余得章氏此良方，乃读章氏给孙砚孚医师谈虫类药的两封信中所获得。（原文载于《中医百家言》）章氏曰：对于慢性肝炎一病，我过去亦用丹栀逍遥治疗，效力不著。自从运用虫类药物地鳖虫与红参为粉剂口服，每能获效。余将之用于治疗肝肿大病人，每著效应。深感章氏之言不谬。

厦门市医药研究所 柯联才

试析《伤寒论》阳明病 篇猪苓汤证

《伤寒论》于阳明篇列出猪苓汤证，意在提示阳明

易从燥化这一病理特征，并通过变证强调利小便是阳明病一大治禁。但此证在归类及注释上问题不少，须进行辨析并为之正名。

一、关于病证归类

较统一的认识（如五版教材《伤寒论讲义》等）是把猪苓汤证（223条）归属于“阳明病本证”中的“阳明热证”的范畴。《讲义》并注释称“本条是下后津液受伤，阳明余热犹存。”问题在于：若确属“阳明余热”的话，猪苓汤何以能治之？何况224条还有“阳明病”“不可与猪苓汤”之禁。可见，把猪苓汤证归类于“阳明热证”是张冠李戴，名实不符。

此证本属“阳明热证”下后热陷膀胱水气内停的一种变证，即变为不是“阳明热证”的一种“证”。其实，归属阳明病的这种认识是受柯韵伯的影响，柯氏称“栀子汤所不及者，白虎汤继之；白虎汤所不及者，猪苓汤继之，此阳明起手之法。”大多注家对此说推崇备至，我是不赞成的。阳明“起手”，怎能“起”到下焦膀胱病呢？病在膀胱的水气病，又怎能与病在胃肠的燥化病相提并论呢？

二、关于脉浮发热

猪苓汤证既然归类于“阳明热证”，那么“脉浮发热”自然是“阳明余热”了。《讲义》及多数注家均持此说。问题是：“阳明余热”，在猪苓汤之治中如何体现呢？且不说二苓、泽泻、阿胶，即使滑石，讲成清“阳明余热”也是不通的。其实，只要承认猪苓汤证有内热，那怕是热在下焦膀胱，也会通过经络（膀胱经本布于体表）外蒸升浮于肌表，而出现“脉浮发热”的，如此理顺成章，何必非要讲成“阳明余热”呢？

三、关于渴欲饮水

《讲义》把“渴”的机理也责之于“阳明余热”，意为热灼津亏。问题是：仲景治阳明热灼津亏之渴每加人参，而猪苓汤中却只有阿胶。更何况猪苓汤乃利水之方，若果是阳明津亏之渴，还能“猪苓汤主之”吗？其实，水气病的口渴，多属气不化津，津难上承。阳虚停水如此，夹热停水也如此。只是水停下焦膀胱的口渴，较之三焦气化失职蓄水五苓散证的“消渴”，程度较轻，只是“欲饮水”而已。这是因为水停下焦，但中、上二焦气化尚属正常，部分津液仍能输布于口舌的。

《伤寒论》于阳明篇列出猪苓汤证，意在提示阳明